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意涵、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向

贾 晋[a],吕进鹏[b]

(西南财经大学 a.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00)

摘 要: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农业常规生产力的超越,既是依托新型要素重新定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过程,又是同频协变乡村治理方式的政治过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乡村治理理念再度升级、治理体系迭代更新、治理机制不断优化的根本动因。通过涉农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新质劳力的整体性跃升、要素活力的适配性激发与算法红利的切合性释放,农业物质力得以转化为乡村治理力。面对基层形式主义和乡村治理"内卷化"、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数字鸿沟、"异化小农"惯性以及乡村公共性再生产难题,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畅通县域城乡数字要素深度融合渠道,推进空间均衡性治理;积极培育新质劳力,充分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治主动精神;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公共性再生产增进乡村有机联结。

关键词: 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村生产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城乡融合;新质劳力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5)02-0026-09

一、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1]10。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强烈历史自觉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体现。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仍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管党治党宽松软、公共服务能力不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主体缺位与权力异化、民主政治与民生利益脱嵌等问题。如何推动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破解乡村治理的诸多难题成为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在"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3]的新征程上,需凭借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驱动农村生产方式变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培育新质农民,着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近些年来,涉农领域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目标要求、现实困境和实现机制等进行了充分研究。一是重点探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乡村治理的基础方位。如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就是政治主体将分散的、城乡分割的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结为一体,乡村治理成为国家整合基础性社会的核心任务[4]。构建乡村治理基础性秩序就是要在乡村社会塑造一套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结构[5]。乡村德治的内涵在于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道德规范

收稿日期: 2024-12-27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5.02.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GLB09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ZZ031)

作者简介: 贾 晋(1980—),男,四川绵阳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经济。E-mail:34481638@qq.com

整合乡村社会[6]。二是关注到数字技术的嵌入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趋势。学者们认为，数字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传统结构，提升了治理效能[7]。然而，他们也认识到治理中的数字风险、技术悬浮、“数字遗民”等问题[8]。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数字技术供给、加强党建引领[9]、优化治理体系、健全民主制度[10]等措施。三是结合城乡融合发展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如有研究认为，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资源要素融合化[11]以及空间共同体的重构[12]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目标要求与实践指向。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于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活力、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虽然已有研究为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现实启示与实践路向，但在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激发乡村治理新动能、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仍显不足。本文依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形成乡村社会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并深入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乡村治理难题，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理念的升级、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与乡村治理机制的革新。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内蕴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每一次实质性进步，都相应促进了生产方式革新、生产关系优化。正如马克思所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3]。在农业领域中，生产力同样是调节乡村社会关系、变革乡村治理方式的原动力。囿于历史环境和农业经济特性，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陷入“内卷化”困境，因而需要农业生产力的新质态，以驱动乡村社会的系统性、科学性、时代性变革。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催生乡村治理理念的再度升级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证明，思想解放和认识升华是革命和改革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14]一段时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僵化落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倾向，治理主体身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小微权力腐败之中。这一现状的根源在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短板。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再升级的根本动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可以实现农村物质生产方面的破旧立新，也能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精神意识、思想活动等方面的革故鼎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质内涵在于强调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科技化、数智化、生态化、休闲化。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自然要求作为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个体、新乡贤、社会组织等在思想上要自觉与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在开展乡村公共事务活动时，各治理主体需要更新自身的理念认知，充分发掘科技、智能、数字、生态等新型生产力要素的巨大潜力，通过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和智能化的治理方式，在“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发挥好农业农村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1]66的过程中实现思想的解放、理念的改进。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促使乡村治理体系的迭代更新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一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体系革命。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新表达、新常识在农业领域的扩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带来农业领域物质利益的繁荣，而且使产业要素延伸至乡村政治生活，促进乡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治理制度体系的迭代更新。首先，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引发乡村治理关键信息与话语体系的重构。农业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话语体系

与符号表达,揭示了其驱动力主要源自新科技、新要素和新动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更新。它标志着对农业发展方式、农业功能性、农业业态及农业农村关系的认识深化和战略调整。”[15]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制造等新兴技术驱动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时,这些技术不仅革新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也深刻影响了农业经营主体与乡村治理者的思维观念。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治理理念融入了智能与科技的元素,促使他们注重运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概念来重新定义乡村治理的内涵,强调将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生态化、技术化作为表达乡村政治活动的要旨。其次,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优化。在调节乡村社会关系、制定乡村公共产品分配规则、协商乡村公共事务以及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突出强化以数字化治理转型为契机、技术赋能治理的提质增效为核心,拓展智慧治理、生态治理、高效能治理新领域,打造乡村治理新版本、激发治理主体新动能。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乡村治理机制的系统性改革

全面深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系统性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的关键举措。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根本动力源于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6]。新时代乡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革新,以及农业生产力的跃升,是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要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不难看出,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振兴,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前提。乡村多元主体在参与技术含量高、生产链域广、人力资本强、驱动力度大的产业活动时,必然要借助以智慧化、网络化、数字化、物联化、组合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媒介,这无疑会倒逼乡村治理机制发生创新性变革。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颠覆性变革,其实质是乡村社会凭借上述创新性的媒介,驱动主体参与、生产经营、产权界定、利益交换、收益分配、公共服务、生活消费等多个领域体制机制的系统性调整,从而自然地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向更为简约化、高效化、精准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以建设农业强国为价值导引,依托科技创新力量、现代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推进涉农领域生产的高科技化、高效能化、高人力资本化、高知识化,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以治理方式的改进、治理主体的成长、治理资源的整合、治理过程的优化、治理效能的增强为核心要旨的治理进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塑乡村新型生产关系,搭建起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融通桥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乡村治理新动能,方能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涉农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治理方式数智化

治理方式的革新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必须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1]101。治理方式的创新,实质是治理技术、治理手段的进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将数字技术等新型要素融入涉农产业,加快建设农文旅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实现“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17]。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农业常规生产力的超越既是依托新型要素重新定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过程,更是同频协变乡村治理方式的政治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由计算力、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不仅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变革，而且深刻促进治理形态从传统的层级式、指令式向网络化、平台化转变，引发治理在空间、结构和范围上的重大调整[18]。要将数字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农业物质生产能力，需要具备一定数智思维意识、数智素养、数据运算技能的新质治理者、新质劳动者来处理纷繁复杂的治理信息，调节数字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将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所凭借的数字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区块链等新型要素有效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

（二）新质劳力的整体性跃升：治理主体专业化

农业生产力由常规形态升级为新型质态，归根到底在于劳动力的变革。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的三大基本要素，三者共同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19]。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换言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涉农领域中“人的本质力量被激发的过程”[20]。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特别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2]

乡村治理主体既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同时也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算力平台和数字工具，参与到数字生产和智能服务的过程中来，成为创新创造的主体。”[18]农业新质劳动力集高质量农业劳作与高效能乡村治理为一体，这种身份复合性的实质是凭借现代科技、人工智能、数字算法、网络平台、绿色低碳理念重新培育新质劳力，增加人力资本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诸如在开展村民选举、协商村集体事务、调节利益分配、化解矛盾纠纷等过程中，新质劳力将经济活动中习得的数字媒介、锻造出来的智慧品性嵌套渗透至公共事务治理活动，依托信息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参与、智慧化协商、专业化决策和平台化监督的能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塑造新质劳力的首创精神，激发新质劳力的治理伟力。

（三）要素活力的适配性激发：治理机制民主化

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现代化、社会化，就是要“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形式，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21]。然而，当前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地方群众对村务不热心，缺乏参与积极性主动性，以至于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怪现象”[22]。农业农村领域，村民民主参与感低下，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常规生产要素供给的失衡。“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合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要素配置低效导致治理机能失效。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旨向在于激发知识、数据、技术、管理、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活力，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农业生产力质态极力保障乡村民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新质民主的生成，乡村民主动能的激发、民主机制的完善，有赖农业生产要素的适配。首先，涉农领域生产知识、科学技术和经济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被适应性地引入并融入村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追求之中，将进一步重塑治理知识、提升治理技术、优化治理理念；其次，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均衡性配置，不仅大幅度提升乡村社会致富增收的能力，而且将村民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转化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效能；再次，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铺排，可防止技术、资本等单一要素对村民民主权利的侵蚀。

（四）算法红利的切合性释放：治理目标民生化

传统农业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极其有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延续与“内卷化”、大国小农与农村“糊口经济”的现实迟迟得不到改变，致使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短板。

长期以来，村民们急难愁盼的操心事、愁心事、烦心事在于产业增收和民生保障，如果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利益空间有限、治理议题与民生利益脱嵌，那么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注意力将大打折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1]101。民生利益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起始点。“利益产生政治……只要有利益存在就需要政治，有政治就需要一定的政治形式、治理形式与之相适应”[23]。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高农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其首要目的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实现农村富裕。伴随算法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新的农业增长点，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电商农业、集约农业、生态农业的兴起将极大释放涉农领域的算法红利，使得农业成为致富、能富、享富的优势产业，而这将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共治理活动中参与动能缺乏、参与信心不足的问题。算法农业将大大拓展乡村利益空间、切合村计民生，推动治理目标民生化。

四、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构建农村新型生产关系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所在。然而，上层建筑和治理体制并非能够随着经济基础和物理技术层面的进步而迅速做出同步且显著的变化。乡村治理“内卷化”、城乡二元体制的鸿沟、“异化小农”惯性与乡村公共性再生产难题，使得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呈现非均衡性。

（一）基层形式主义和治理“内卷化”

中国式现代化以保障民生为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领域是关乎民生问题的基础领域，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根本的着力点依然在农村基层本身。一段时期以来，农村基层“层层发文、层层开会、过度留痕、过频考核”等形式主义屡禁不止，部分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党性不纯、深陷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与此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基层组织行政权威戕害村民自治、资源下乡衍生的“精英俘获”“小微权力腐败”等种种弊病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近年来，党中央持续发力整治农村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破解治理“内卷化”难题，正是认识到其带来的极大危害性。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仍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形式主义和“内卷化”顽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工作推进情况看，有的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实际工作中一遇到矛盾和困难又习惯性回到追求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老路上；有的领导干部观念陈旧，名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新瓶装旧酒’”[24]。鉴于高素质的乡村干部队伍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科技素养不足下的责任转嫁、虚拟政绩下的数字形式主义、脱离实际情境下的官僚主义作风、消极应付政策下的疲态乱象等等都将对农业生产力跃迁、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构成严重障碍。

（二）城乡融合发展面临数字鸿沟

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乡村善治的实现归根到底需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数智技能的新质农民。专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既是发展新质农业必需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主体力量。鉴于此，各地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过程中，鼓励城市数字人才“返乡”创业，加快城市数字要素向乡村的流动。然而，在历史底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较大的城乡数字技术鸿沟在短期内无法弥合。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引起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25]。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城乡割裂、城乡差异的基础上演进的。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农业农村这一基础领域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制约着农村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伴随着中国式

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村人口外流、务农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状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反而由于城市要素积聚和虹吸效应，以及城乡数字技术设施建设的非均衡性，城乡数字化发展差距更加凸显。与城市便捷快速的科技转化、数字传播、物联互通能力相比，乡村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社会数字化、专业化、智能化等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资源愈加匮乏。有研究已经指出，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事实是，“真正掌握数字化技术的数字化群众基数较小，其原因主要源于基层民众本身数字素养的程度普遍较低，进而导致这一部分基层民众难以真正参与至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26]，从而沦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因此，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消除广泛的城乡差异，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

（三）“异化小农”惯性与公共性再生产难题

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孕育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马克思将传统小农比喻为“马铃薯”般的自在群体。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得益于小农经济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存，以及基于习俗的自治模式的支撑，但仍无法摆脱“贫、愚、弱、私”的窠臼。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面临集体所有权的异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异化和人地关系的异化，使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力度和意愿不足，更加缺乏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动力，易陷入“公共地悲剧”[27]。

传统小农生产及其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异化，对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约束。“异化小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经营规模、资源整合的生产困境，使得原本微弱的乡村公共性缺乏再生产的土壤。加之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素所驱动的平台化生产生活方式，可能导致原有的公共性要素无法有效激活，进而压缩“异化小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感和利益链接空间。此外，正如有研究所注意到的，面对因资源分配、知识素质、年龄结构而导致的城乡差异，村庄主体受客观困境的约束，无法进行内化接受与外向反馈，形成弱接受与低回应。弱接受与低回应成为村庄边缘人群面对技术下乡的两种集体表现，他们对技术的接受与回应能力有限，造成空心化村庄整体的技术失衡[8]。可见，“异化小农”的公共精神、合作共治、社会资本等的断裂性流失以及对数字技术的弱接受，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不利于乡村共同体建设与公共治理活动的开展。

五、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

处理好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以实现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破除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因素，发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造伟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确保“三农”工作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数智时代乡村领域的产业发展和治理创新，根本上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由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在基层治理中的有益探索[2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9]，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深化乡村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治理体制改革全过程、各方面。乡村基层要在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乡村党员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要自觉肩负起催生农业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以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体责任，完善推动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农业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充分依托农业生产所需的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活动进行可视化、敏捷化管理，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贯穿乡村致富能手选拔、新兴产业培育、政策落实、项目落地、资源分配等公共事务治理的全过程。严格落实党中

央整治形式主义、微腐败的指示精神,强化生态、安全方面的制度约束。着力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基层减负。以乡村产业发展为治理有效夯实经济基础,以深化治理体制改革助推生产力的跃升,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打造乡村高品质生活。

(二)畅通县域城乡数字要素深度融合渠道,推进空间均衡性治理

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的复杂挑战在于,一方面要不断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蝶变,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农业新质生产力变革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必然要以县域城镇为中心辐射带动乡村,这是县域作为城乡空间关系、职能承接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显著、治理层级繁杂的超大型国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县域层面要因地制宜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根据实际需求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升数字传导能力,加快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技等城市经济技术优势融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关系革新的步伐,实现产业要素和治理技术在城乡空间范围的高效流动和均衡分布。不断将农业经济领域的科技平台效果扩散到公共服务、信息对接、矛盾化解、产权制度改革、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组织下沉、利益分配等乡村治理活动。归根结底,只有从市场配置、数智技术、资源共享、空间范围等多维度畅通县域城乡深度融合的通道,塑造农业新业态,探索出"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乡村治理所产生的科技知识溢出效应才能深度显现。

(三)积极培育新质劳力,充分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治主动精神

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改革和建设成就的历史经验表明,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具有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首创精神。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中坚村民流失,留守老人和边缘化村民游离于数字智能时代,"数字难民""数字遗民"等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人力资本配置缺失、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无疑强化了乡村内部的异质性。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根本的内驱力来自具有低碳绿色、人工智能、科技知识储备和数字素养的新质劳力。新质劳力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是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也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因而,要与时俱进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实现乡村治理中人工智能与人民群众智慧的"双智融合"[30],努力激发新质劳力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活力与首创精神,着力构建"改造-吸引-培育"的农业人才"三套车"机制[31],挖掘培养在地和回乡人才,健全外部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城乡之间的人才对口交流帮扶政策,助力新质劳力积累起科技数字创新的资源,提升新质劳力发展农业生产力、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公共性再生产增进乡村有机联结

农业农村既具有独特的物质和社会属性,也糅合着独特的文化属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改造常规农业,突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乡村致富和治理的便捷高效。然而,由此产生的城乡数字鸿沟、网络支配、技术异化、虚实冲突、利益分歧等问题,会进一步侵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乡村普遍的公共道德与共同利益,破坏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文明"脐带"[32]。就此而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与秩序重构,必须植根于历经千年积淀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紧抓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新机遇[33],充分利用"云领域"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投入力度,并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推进"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公私兼顾""为政以德""家国情怀""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等传统文化内容在乡村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是将其中的公共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基层党员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心世界,不断塑造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凝心聚气、培根铸魂,增进乡村有机联结、丰富情感治理,最终提升农业农村领域的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
[2]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 - 02 - 02(01).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4]徐勇. 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5]陈明.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秩序[J]. 政治学研究,2024(2):94 - 107.
[6]邓谨,马千里. 乡土性与国家化:新乡土德治的理论来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85 - 93.
[7]许丹. 从“失衡”迈向“适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性风险及纾解路径[J]. 政治学研究,2024(2):108 - 118.
[8]申恒胜,郝少云,陈栋良.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效度、问题及纾解[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6):137 - 147.
[9]郭晓勇,熊秋良.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缘起、演进脉络和嬗变逻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5 - 34.
[10]袁莉.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5 - 42;
[11]田鹏.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19 - 128.
[12]罗志刚.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回顾与前瞻——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J]. 江汉论坛,2023(8):79 - 84.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14]王静,胡永秋. 推动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N/OL]. (2023 - 5 - 17).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l/2023/0517/c1001 - 32688330. html.
[15]杨颖.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与基本思路[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27 - 35.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1.
[17]罗必良. 论农业新质生产力[J]. 改革,2024(4):19 - 30.
[18]米加宁,李大宇,董昌其. 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本质特征、基础逻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公共管理学报,2024(2):1 - 14.
[19]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姜晶花,张梅,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20]王世泰,曹劲松. 新质生产力的缘起、生成动力与培育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2024(3):10 - 22.
[21]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84.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77.
[23]邓大才. 利益相关: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动力基础[J]. 东南学术,2014(5):40 - 49.
[24]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R/OL]. (2024 - 05 - 31). http://www.gov. 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 6954761. htm.
[25]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5.
[26]王鹏,王向清.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运作机理、实践悖论与风险规避[J]. 河北学刊,2024(6):13 - 20.
[27]付磊,赵利梅. 中国小农经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87 - 95.
[28]蔡跃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J].

管理世界,2021(8):30-45.
[29]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0]姜亦炜.数字化平台推动乡村多元主体参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10(1).
[31]罗必良,耿鹏鹏.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4):13-26.
[32]徐勇.两种依赖关系视角下中国的"以文治理"——"以文化人"的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特征[J].学习与探索,2017(11):59-63.
[33]张志安,吕伟松.增强"虚拟现实":AIGC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J].青年探索,2024(5):25-36.

The logical Implications, Practical Dilemma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Modernizing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JIA Jin[a], LYU Jin-peng[b]
(*a.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b.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cendence of new-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ver the conventio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process of redefining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d on new factors, but also a political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mode of rur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frequenc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rural governance to be upgraded again, the iterative update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rough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agriculture-related technologies, holistic advancement of new-quality labor force, adaptive stimulation of factor vitality, and targeted release of algorithmic dividends, agricultural material strength is transformed into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face of grassroots formalism and the "involu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digital divide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nertia of "alienated small farmers" and the problems of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strengthen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unblock the channel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element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promote spatial balanced governance; actively cultivate new quality labor, and fully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public reproduction.

Key Words: new-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rural production relations;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w-quality labor force

【责任编辑:毛殷】